

变化中的瑞典文化政策： 地方化与欧洲化

郭灵凤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文化政策被纳入福利国家体系,致力于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地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但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进展,瑞典文化政策正经历着地方化和商业化两大趋势的转型。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瑞典文化政策的变化有利于作为跨国行为者的欧盟对瑞典地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进而导致瑞典地方认同发生变化。通过考察、分析瑞典文化政策转型的趋势及动因、瑞典与欧盟文化合作的案例以及文化政策与文化认同关系,本文认为欧盟对瑞典的文化资助虽然是“象征性”的,但这种跨部门、跨地区的文化合作对瑞典文化政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瑞典文化政策的欧洲化”。这个欧洲化不仅体现为以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导向,更涉及欧洲认同建构这一政治文化过程。但是,瑞典各地区文化政策欧洲化的程度并不一致,应根据不同情况慎重评价。

关键词:瑞典文化政策 地方化 欧洲化 认同构建

文化政策是政府实现国家倡导的价值目标、影响民众思想的公共政策工具。19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在“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过程中,艺术文化政策对创建民族文化、塑造国家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国际交往频繁打破了疆界藩篱,而欧洲一体化进程更使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面临空前挑战。在这一理念碰撞、结构重组过程中,民族国家文化政策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对进行中的“欧洲建构”(European Construction)有何作用?本文以瑞典文化政策的变革及其与欧盟的文化合作为案例,试图阐述文化政策在欧盟、民族国家、地区三个管理层面的相互影响,并初步探讨地方文

化政策的变化对欧洲文化认同的影响。尤其集中讨论三个问题:瑞典文化管理体制变革的动因何在?在此过程中,欧盟作为一个跨国行为者,是如何施加影响的?文化政策地区化的趋势对欧洲认同建设有何意义?

一 瑞典文化政策改革的地方化趋势与欧洲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文化政策纳入福利国家体系,以保障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相结合为特征。瑞典政府不仅为公民提供经济安全、社会保障,还要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文化环境”,通过公共财政拨款资助各级文化团体,改善艺术家的工作条件、保障艺术自由,同时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机会。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危机和欧洲一体化的进展,瑞典文化政策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型,地方化和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地方化主要体现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而商业化趋势则日益强调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两个趋势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纠结在一起。

瑞典文化政策的地方化改革其思想背景是,瑞典文化战略从“文化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演变为“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20世纪上半叶,在劳工运动背景下上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人民会议厅、人民公园(the People's Halls and Parks)成为各地新型的公共文化设施。在“文化民主化”策略指导下,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各级文化机构,根据人口分布和行政区域传播文化艺术。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建立覆盖全国的文化机构网络为目标的“文化民主化”策略逐渐为推动公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文化民主”策略所取代。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对人口文化习惯的调查表明致力于实现全国各地区平等共享文化资源的“文化民主化”尝试并没有达到“文化服务于全体人民”(culture for all)的目标。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享有经济特权、居住在城市的阶层,成为公共资助文化活动的主要受益者,而大多数普通人仍旧接受娱乐工业提供的商品化的文化产品。因此,随后的“文化民主”策略更强调以地方文化活动为基础、包

John Myerscough,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in Sweden: Report of a European Group of Experts*, Council of Europe Council of Cultural Cooperation,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Reviews Programme,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90, p. 13.

含更广泛的文化目标,要使文化成为“一个我们都参与的过程”。

“文化民主”策略不仅改变了政策重点,而且直接关联着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瑞典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特点是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分离。在国家一级,议会和政府各部共同制定文化政策、决定资金分配,而政策执行机构则是独立的事务局,其下设各种委员会。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Swedish Nationa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是最重要的文化政策执行机构。在地方一级,由于不存在管理地方政府文化事务的国家立法,瑞典地方政府在自主决策和税收方面拥有广泛权力,市镇大多资助、管理公共图书馆和本地文化活动,而郡委员会主要负责音乐、戏剧和博物馆三个领域。中央、郡和市镇三级政府公共文化支出的比例分别为43%、7%和50%。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瑞典国家文化政策中的地方分权趋势不断增强,从刚开始的文化分权、资金分权逐渐演变为政治分权。文化分权(cultural decentralisation)意在公平地分配文化产品;资金分权(financial decentralisation)涉及公共文化支出在国家、地区和地方三级政府间的再分配,目的是增加地方资助;政治分权(political decentralisation)指的是在国家、地区和地方三个层面的决策者之间,重新调整政治决策的过程,比如允许地方决策者对他们希望资助的文化活动投入更多资金。瑞典文化政策地方分权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艺术文化成为经济和地区发展计划的工具,二是国家行政机构在文化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日益被国际机构的艺术资助所取代,比如欧盟结构基金不断资助地方文化事业。

那么,除了自身发展过程中“文化民主”策略的要求,瑞典文化政策的地方化改革是否存在外在动因呢?应该说这一改革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的后民族国家时期公共行政系统的改革对瑞典文化政策的变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在自由资本与社会主义党主导的政府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逐渐演变为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为特征的福利国家体制。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经济危机

PeterDuelun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Summary”, in PeterDuelund e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Copenhagen: Nordic Cultural Institute, 2003, pp. 509 - 510.

“Cultural Policy Database, Sweden, in Culturelink Network”, <http://www.culturelink.org/culpol/se.html>,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MichelBassand, *Culture and Regions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1993, p. 56.

PeterDuelun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Summary”, pp. 509 - 511.

引发资本合并浪潮,巨型国际公司联合体形成,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一个“世界体系”(world-system)。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去国家化的政治潮流,日益国际化的经济体要冲破民族国家政府的种种限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民族国家政府开始向后民族国家社会组织转型,而随着欧盟的建立,民族国家内部公共行政机构也经历了相应的改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瑞典公共行政机构开始结构重组,学校和保健服务系统首先出现重组、去规则化过程,专家管理传统被打破,引入了新型的混合行政管理。这一革命性的公共领域管理体制改革,在90年代达到鼎盛,并且扩展到其他公共领域。在陶·拉尔森(Tor Larsson)看来,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是20世纪90年代在教育、保健、社会服务等领域开始的政府行政体制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新阶段。

2002年1月,瑞典议会决定,授权全国所有的郡组成以促进地区发展为目的的市政协调团体,并决定斯高纳(Skåne)、万斯塔·哥塔兰德(Västra Götaland)两郡有权继续保有其地区议会决策团体,即地区大会(a regional assembly)。这两个地区大会分别由这两个郡的33个和45个市组成,并分别包括2个和3个联合的郡委员会。这种新的市级和地区级的联合体代表了一个新的公共管理层级。它们的任务是在咨询中央政府的情况下,规划本郡的发展,协调郡行政、立法机构的各项活动,执行地区与中央政府制定的发展协议。而市级、地区级行政机构的责任包括为发展协议提供财政支持,决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准备申请欧盟结构基金等。在新的行政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下,各地区的文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斯高纳、万斯塔·哥塔兰德和卡尔马(Kalmar)等地区已经表现出新的文化政策取向,更趋向于与欧盟合作。虽然瑞典文化部对此持消极态度,但内政部首先与新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接触,并就相关的文化政策事务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机构分担责任。

瑞典文化政策的地方化直接导致了文化管理体制中的绩效行政。20世纪90年代,在文化、产业和地方分权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形下,瑞典文化管理体制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的行政管理(performative-based forms of administration),取代

Jürgen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 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Limit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New York: New Left Review, 2000, p. 292

Tor Larsson, "Cultural Policy in Sweden", in Peter Duelund e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Copenhagen: Nordic Cultural Institute, 2003, p. 232

ibid., pp. 230 - 232

了先前基于“一臂之隔”(arm's length)管理原则的行政体系。这一改革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占了上风,即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不再是其内在的艺术价值,而是其经济和政治实用性。虽然许多艺术资助项目仍然强调自治管理和“一臂之隔”原则,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正在被绩效管理取代。在国家、地区、地方各级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内部,经济目标、统计工具、绩效管理、固定合同等机制日益发展完备。而绩效管理又是与文化政策的政治、经济工具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1996年瑞典文化政策的目标调整为7个。除了保留1974年文化政策决议中原有的“保障言论自由”,“为社会成员参与文化活动创造平等机会”,促进文化多样性、艺术创新,“反对商业化的消极影响”,“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原则之外,新文化政策强调要“使文化成为一个有活力、独立和具有挑战性的力量”。为了对抗高失业和社会排斥,为了经济持续发展,各地区、地方部门开始大力投资文化活动、艺术中心和各种节日。因为,文化可以赚钱,文化创造就业,文化团结了地方社会。文化政策的重心日益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区和地方层面。

原来主管文化事务的国家文化事务管理委员会现在多以建议和合作的形式参与地区文化事务。分配资金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尽管1975-2000年瑞典国家的文化艺术支出比重大体保持不变,但国家对图书馆、戏院、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活动的固定补偿在逐渐减少。固定补偿的目的是推行“胡萝卜”原则(“carrot” principle),保障地方和地区的特殊文化目标。而现在,国家的资助更多的是以基金群的方式分配,地区、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文化协调团体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委员会就地区文化发展签订协议,并且在文化协议的限定范围内,有权独立处置中央政府为地区文化机构和各种地方文化目标提供的文化资助。但是,文化协议所遵循的契约协议制度(the contract agreement systems)对地方决策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与地区、地方政府的谈判中,国家在决定国家资助花在什么地方和在何种条件下使用资助这些问题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这一改革总体上加强了决策的分权形式。总而言之,取代了自动补偿

Peter Duellun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Summary", pp. 518 - 519.

"Cultural Policy Database, Sweden, in Culturelink Network", <http://www.culturelink.org/culpol/se.html>,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所谓的“胡萝卜原则”,就是为了使文化政策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地方层面,引入的自动补偿机制。在地方投入的基础上,国家增加相应的一笔投资,目的是动员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对文化机构投入资金。

机制的协商契约模式,给地方政府更大自由,给国家更多权力。

二 文化治理:欧盟与瑞典的文化合作

在瑞典文化政策日益经济社会工具化和行政管理地方化的转型过程中,欧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是一个在全欧范围内积极推行文化艺术的经济功能的跨国行为者。参与欧盟文化教育领域活动的欧洲国家共有 32 个,包括欧洲经济区国家(the EEA countries)和申请入盟国。在 1998 年的工作报告《文化、文化产业和就业》当中,欧盟委员会强调了文化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对于就业、出口和工业附加值都具有重要意义。欧盟的文化项目、结构基金和不同类型的地区发展资助已经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欧盟在文化领域的种种作为与民族国家推行传统文化政策的活动有很大区别。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欧盟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不能干涉成员国政策,其在文化领域的作用主要是遵循辅助性原则,在促进对欧洲各族人民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传播、保存和保护具有欧洲意义的文化传统、艺术和文学创作等方面支持和补充成员国的活动。因此,欧盟与成员国的文化合作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项目和共同协议来实现的,而欧盟对欧洲各国文化政策施加影响的主导思路则是“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指的是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自愿、非赢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来自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赢利团体等各种性质的机构和个人,涵盖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政策领域,涉及跨国、民族国家、地区、地方等不同地理和行政运作层面。通过跨部门、跨地区的文化合作,形成一种新的治理关系。尽管这些参与治理过程的不同机构和出发点并不相同,如公共部门意在使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去国家化过程合法化,私营机构强调“良好的合作治理”,非政府组织则关注促进公益,但“文化治理”为不同机构之

Peter Duelun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Summary”, pp. 516 - 517.

“Culture,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mployment”, The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Paper, SEC (98) 837, Brussels, 1998.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rticle 151, Cited from EUR-Lex, <http://europa.eu/en/eur-lex/en/treaties/selected/livre234.html>,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

间在一个互动体系中相互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本文主要讨论欧盟与瑞典文化合作中的“文化治理”现象,集中考察文化管理机制的重叠、跨部门合作、跨地区多重治理三个方面。

瑞典 1995年加入欧洲联盟。与欧盟相关的工作是瑞典文化部的重要工作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化 2000 项目 (Culture 2000)和梅迪亚计划框架下的文化合作项目和共同协议。“文化 2000 项目旨在促进文化发展、增进艺术家的流动性、为传播他们的作品创造更好的条件。梅迪亚计划,即促进视听工业发展的措施 (MED A program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diovisual industry),主要补充成员国对欧盟视听产业的支持,以增强其竞争性、促进具有欧洲视野的作品的流通。瑞典电影协会的瑞典梅迪亚中心 (MED A Desk Sweden)为瑞典国内愿意参与该项目的团体和个人提供信息服务。无国界电视计划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为媒体领域提供了某种束缚性的法规。

在各成员国管理欧盟文化项目的机构称为文化联络点。瑞典文化联络点 (Cultural Contact Point Sweden)是常驻瑞典的欧盟文化事务信息办事处。它为申请各种欧盟文化资助的项目提供信息服务。在欧盟委员会授权下,瑞典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和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 (National Heritage Board)负责文化联络点的工作。其中,瑞典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负责文化艺术活动,而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负责文化遗产项目。设立文化联络点的目的是增进瑞典文化工作者对与文化相关的欧盟项目的了解,同时也帮助瑞典文化工作者了解自由贸易、竞争、国家资助、版权、增值税等领域的欧共同体立法。此外,瑞典文化联络点还负责跟踪瑞典国内与欧盟文化项目相关活动的进展状况;派送来自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机构的与文化相关的政府文件、新闻出版物等;与其他文化联络点和相关机构交换信息、开展交流活动,如与瑞典电影协会的瑞典梅迪亚中心和瑞典国家档案馆、与欧盟驻瑞典的各级国家、地方机构保持合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瑞典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和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并不是专职的欧盟驻成员国文化事务机构。瑞典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是执行瑞典政府和议会决策的国家文化政策的中央政府机构,其主要功能包括分配国家政府

Danielle Cliche, Ritva Mitchell and Andreas Wiesand eds., *Creative Europe: o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of Artistic Creativity in Europe*, An ER Carts Report to the NEF, Bonn: ER Carts, 2002, p. 21, 119.

“Work in the EU, Ministry of Culture, Sweden”, <http://www.sweden.gov.se/sb/d/8371/a/74131>,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 2007年 12月 28日。

对各领域文化工作者的资助,调查、收集与文化事务相关的信息,评价国家文化政策的功效,为未来预算提供决策依据。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是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监督的中央政府机构,其具体工作包括对历史遗址实施法律保护,分配建筑维修资金,收集、整理和传播关于文化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知识信息,提供文化遗产保护和建筑维修的专业技术服务等。因此,这种文化管理机构职能的重叠恰好反映了欧盟在文化领域权力受到成员国政府限制的现实。

文化管理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安东尼·埃维瑞特(Anthony Everitt)在《文化治理:整体性文化计划和政策取向》报告中指出,在传统文化政策中,管理艺术、媒体和文化遗产等文化政策的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互不关联、各自为政,而扶持文化事务的公共资金往往因经济不景气而缩减,导致文化政策不能落实。他强调,除非采用全局性、整体观念的治理模式以及实际的操作方式,跨越各自为政的行政设置,实现“横向”跨部门合作,否则文化政策不能完全落实。近年来,瑞典政府着力促进各部门横向合作,开辟新的部门合作领域,如文化与学习、环境保护、地区发展、文化产业与就业、文化与健康等。而欧盟与瑞典的文化合作在跨部门合作中主要表现在地区结构基金的使用上。

欧盟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s)旨在消除欧盟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欧盟对瑞典文化领域资助中占很大比重。它采取联合资助的形式,即被资助对象国也必须出资补充结构基金。1999年3月欧盟理事会上,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共同决定了2000年议事日程的政治协议。1999年6月欧盟部长理事会决议,将结构基金应用于2000-2006年的项目。其目标有三:目标一是促进有特殊发展需要的地区的发展和结构调整。瑞典北部诺兰地区(Northern Norrland)和南部森林郡包括在内。目标一的活动涉及利用和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发掘地区文化遗产价值。瑞典获得7.22亿欧元资助。目标二是为存在结构问题的地区提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调整的资助。瑞典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以及一些岛屿得到了4.06亿欧元的资助。目标三是增

“Sweden”, 对 *Compendium of Cultural Policies and Trends in Europe* (7th edition), Council of Europe/ER Carts, 2006, p. 5, <http://www.culturalpolicies.net/web/profiles-download.php>,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Anthony Everitt,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e: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Cultural Planning and Policies*, Cultural Polic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it, Policy Note No. 5, Belgium: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1999, p. 8, 13, 17.

强个人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瑞典得到了 7.20 亿欧元的资助。除三个优先政策目标外,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结构基金还为四个共同体领域的活动提供资助,地区合作 (Interreg),推动欧洲跨边界、跨国、跨地区合作;平等计划 (Equal),即打击劳务市场歧视和不平等的跨国合作;引导计划 (Leader),支持乡村发展,由瑞典乡村发展署 (Swedish Rural Development Agency) 负责;城市计划 (Urban),支持城市发展,由国家工业和技术发展局 (National Board for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负责。欧盟结构基金并不是一个文化项目,而是地区发展项目,但是文化部门的参与使这个项目受到了文化政策的影响,如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参与了乡村发展项目“引导计划”,通过发掘乡村发展的新途径,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加强了地方认同。

欧盟与瑞典的跨地区文化合作管理机构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文化联络点。但是,在具体的文化项目合作过程中,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的机构协作至关重要,如欧盟委员会规定的结构基金的四个原则之一就是“合作”,即在结构基金从准备到实施的每个政策环节,在每个成员国内,欧盟委员会都要与国家、地区、地方各级政府保持尽可能紧密的合作。也就是说,欧盟的结构资金是针对瑞典各地区发展的,因而地方政府、地区组织与欧盟的直接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合作体现了多重治理的特征,“决策职能由各级利益相关者分享,而不是由国家政府垄断”,次国家层面的行动者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领域行动,在此过程中开辟了跨国家的联系。民族国家政府不再能够垄断国内政治力量与欧盟之间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层面的行动者,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斯堪特卡尔 (Skåftekärr) 地方组织保护俄兰岛 (Öland) 文化遗产的项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瑞典俄兰岛地区政府宣布要出售当地斯堪特卡尔森林区的地产,进行新的经济开发项目。这一决定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对,600 名成员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斯堪特卡尔视界” (Vision Skåftekärr),决定阻止政府的行动,保护地区文化遗产。这个组织申请到了 1994

“The Structural Funds in Sweden in 2000 - 2006”,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country/overmap/sv/sued_en.htm,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 2007 年 12 月 28 日。

Helen Wallace and William Wallace eds., *Policy 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54.

Liesbet Hooghe and Gary Mark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p. 3 - 4.

- 1999年度欧盟结构基金的资助,从当地政府手中买回了森林地区的地产,并建立了森林学校、博物馆、展览厅等设施,如今每年大约有4万游客到此参观游览。

需要指出的是,瑞典各地区得到欧盟资助的情况不同,以上案例只说明了部分受资助项目和地区的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估算欧盟与瑞典的文化合作对瑞典文化政策的影响呢?一个显而易见的途径是对年度文化预算的比较。瑞典政府预算分为27个支出区域,由瑞典议会法案确定,每个支出区域中包括一个或多个政策领域。其中文化部负责两个政策领域:文化政策和媒体政策。2007年文化部的预算包括第一支出领域的媒体政策部分7.22亿瑞郎,第十七支出区域的文化政策部分61.04亿瑞郎、媒体政策部分3.3千万瑞郎和体育政策部分4.45亿瑞郎。如果除去体育政策部分的预算,瑞典政府2007年在媒体和文化政策领域的投资将达到68.59亿瑞郎。这些资金将用于文化遗产、戏剧、舞蹈、音乐、艺术活动、建筑、设计、电影、文学等等文化政策领域和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审查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等媒体政策领域。

那么,欧盟每年对瑞典文化事务的资助又是多少呢?笔者没有拿到确切的数据,因而只能估算。根据2006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1855号决议,2007-2013年欧盟文化项目预算支出达到4亿欧元,平均每年6.6千万欧元,折合约6亿多瑞郎。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这笔支出均摊到每个国家想必不会太多。其他领域涉及文化事务的资助,以结构基金为例。2000-2006年欧盟地区政策结构基金中共同体行动领域对瑞典的支出共计2.78亿欧元,折合23.84亿瑞郎,平均每年约3.97亿瑞郎,这其中涉及文化事业的支出当然少之又少。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欧盟对瑞典的文化资助远远低于瑞典政府的文化支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然而,正是这种象征性质的欧盟文化资助通过跨部门、跨地区的文化合作,对瑞典文化政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体现,我们称之为“瑞典文化政策的欧洲化”。而这个欧洲化不单单体现在发掘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更重要的是涉及欧洲认同建构这个

“A Community of Cultur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rts”,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p. 17, http://ec.europa.eu/publications/booklets/move/31/txt_en.pdf, 最后一次访问为2007年12月28日。

“Budget and Objectives fo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http://www.sweden.gov.se/sb/d/8371/a/74129>,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Culture Programme: A Serious Cultural Investment”, http://ec.europa.eu/culture/eac/culture2007/cult_en.html,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政治文化过程。

三 认同构建:欧洲化与地方化

文化政策所涉及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实施,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文化政策的目标,而“文化认同”建构就是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根据文化政策的不同目标群体,认同构建可以发生在地方或地区、国家层面欧洲层面,甚至是世界层面。比如,地区的文化政策就可以隐含“认同”目的,包括:组织音乐、戏曲、电影等文化节;举行地方博物馆艺术或历史展览;鼓励本地艺术家建立团体;修复城市和乡村建筑遗产;保护自然遗址;出版和推广地区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即使这些文化活动包含了世界性的、前卫的和精英的内容,它们仍然使地区被外界认识和承认,提高了它的声望、名气,并加强了地方认同。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赫尔德(Herder)关于文化的概念在欧洲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文化概念中,民族与语言结合成为统一的民族精神。就国家文化政策而言,艺术决不仅仅是实现个人自由、教育和启蒙的途径,它还被用来在民众中塑造对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而如今的欧盟,正如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一样,也经历着同样的认同构建过程。

杰拉德·德兰提(Gerard Delanty)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欧洲认同概念,包括个人经验中的欧洲认同、布鲁塞尔机构框架下的欧洲集体认同和更广泛意义的复数的欧洲文化认同。在个人认同的层面,欧洲认同是个人对欧洲文化或政治的认同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欧洲集体认同的存在。布鲁塞尔试图建立一种官方集体认同,这种认同服务于法律规范功能。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文化领域显然不能再处于建设欧洲大市场进程之外了:这个进程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文化区。”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首次在文化领域赋予欧盟各种权力,其目的在于以文化为工具创建一个“各民族的欧洲”(Europe of the peoples),在承认和尊重文化、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同时,提高属于一个共同社

Michel Bassand, *Culture and Regions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1993, p. 186.

Peter Duellund, "The Nordic Cultural Model, Summary", pp. 488 - 489.

Gerard Delanty and Chris Rumford, *Rethinking Europe: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54 - 55.

European Commission (CEC) 1988a, 4, Cited from Cris Shore, *Building Europ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5.

会的归属感。

除了通过立法,欧盟还采取了三种策略来创造欧洲认同。其一是利用标志、象征、仪式等手段将欧盟形象化。1984年“人民欧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People's Europe)建立。欧共体采纳了这个委员会的建议,采用一系列新的标志,以表明欧洲一体化事业建立的原则和价值,如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为欧共体的乐曲、采用了12颗星欧共体旗帜、实行统一的欧洲护照、选取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日期作为欧洲公共节日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加强共同体认同和增进欧洲公民及其世界各国对欧共体的印象。1993年的德克勒克报告建议欧盟将欧洲作为一个“品牌产品”推销给公众。这些努力的结果之一是赋予了欧盟某种实体,“欧洲”不再是无形的了。

其二是突出联系整个欧洲大陆的精英知识文化传统。欧洲学术界正在批量生产哲学、艺术、思想史、考古、比较宗教学作品,以此创造一个新的古代欧洲文化遗产谱系。这些遗产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世纪教会、加洛林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其他今天欧盟的前身。那些曾经在民族国家文化构建过程中树立的文化象征,现在又成为欧洲传统的代表了。虽然有些学者批评这种为了对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罗列的所谓的欧洲文化遗产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缺陷,但在欧盟官方文件中,这些文化遗产反映的是“欧洲人民共享的基本价值”。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以这些价值为基础的。

根据乔纳斯·弗瑞克曼(Jonas Frykman)的分析,欧盟创建欧洲认同的另外一个策略放在了地区层面,即通过民众文化活动来建立政治合法性。欧洲遗产日(European Heritage Days)就是一个例子。1991年欧洲理事会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启动了欧洲遗产日活动。其目标是提高公众对欧洲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鼓励欧洲范围内的宽容;加强欧洲人的

Cris Shore, *Building Europ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47 - 56

Jonas Frykman, "Belonging in Europe, Modern Identities in Minds and Places", in *Ethnologia Europaea* 1999, pp. 15 - 16

Cris Shore, "Inventing Homo Europaeu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thnologia Europaea* 1999, p. 60

"A Community of Cultur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rts",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p. 3. http://ec.europa.eu/publications/booklets/move/31/txt_en.pdf,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Jonas Frykman, "Belonging in Europe, Modern Identities in Minds and Places", *Ethnologia Europaea*, 1999, p. 16

认同感;促使公众和政府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迫切性等。这个全欧文化盛事的主题是每年9月份的某一天关注欧洲各国一个特别的文化场景。这一天,历史遗迹向公众敞开大门,公众通过免费游览参观,了解共同的文化遗产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2005年49个欧洲文化公约缔约国参加,游客人数接近2千万,3万处欧洲历史遗迹参与了此项活动。瑞典从1996年开始每年都参与欧洲文化遗产日的活动,主要由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组织。2005年瑞典欧洲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海洋遗产。重塑欧洲知识文化传统以及“欧洲文化遗产日”等为原来的民族国家文化遗产打上“欧洲”印记的活动,反映了欧盟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策略,即以欧洲话语取代民族国家话语,使民族国家叙述边缘化。

除了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之外,在地区层面,加入欧洲文化区的最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欧洲城市将文化纳入其城市发展规划。隆德市(Lund)申请成为2014年欧洲文化之都的努力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1985年开始,欧盟每年选择两个欧洲文化之都,以展示欧洲丰富的文化资源,鼓励欧洲公民相互了解各自的文化。2014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将要在瑞典和拉脱维亚两国的众多城市中产生。隆德位于瑞典南部,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中世纪小城,同时还是人文汇聚的大学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的人们都途径这里。但是随着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尔默的崛起,隆德渐渐失去其“人文汇聚之地”的优势。因此,隆德市政府决定申请2014年欧洲文化之都项目,以期重建文化基础设施、活跃文化生活、使古老的中世纪城市重现生机。在隆德市政府看来,申请这一项目不单单是文化事件,更事关城市发展规划大计,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借此机会,隆德市将重新思考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隆德市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城市?怎样达到这个目标?隆德市未来的走向如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商业界、大学和艺术界将加强合作、团结一致。

事实上,城市发展规划过程就是一个地区和地方认同重新定位的过程。桑特利维尔(P. Centlivres)提出了三种认同模式,即历史和文化遗产认同、规划认

“L'Histoire des JEP en bref”, <http://www.jep.coe.int/sdx/jep/showPage.xsp?path=/about/history>,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Cris Shore, “Inventing Homo Europaeu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 54.

“Lund 2014 for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http://www.lund.se/kultur/Page_34229.aspx,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07年12月28日。

同和经验认同。这种建立在地区计划基础上的规划认同(projective identity)在地方文化政策目标中越来越明显。而在重新规划的认同中,隆德市作出了一个有趣的选择,它不再将自己局限于以斯德哥尔摩为中心的瑞典南部城市这样一个位置,而是将自己编织进了遍布欧洲大陆的欧洲文化之都的网络之中。这意味着隆德市关于中心-边缘的地理空间认同发生了改变。正是在这点上,“欧洲的”正在成为“地方的”,而与此同时,“地方的”也正在成为“欧洲的”。

杰拉德·德兰提(Gerard Delanty)提出的更广泛意义的复数的欧洲文化认同,涉及民族的、地区的欧洲认同,是一个自我理解的模式,团体、社会和公民个人通过这种自我理解来定义自身以及同他者的关系。而在文化领域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反过来会导致自我理解的变化,即认同的变化。当欧洲文化治理已经对欧盟、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生影响之后,地方的认同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正如米切尔·巴萨德(Michel Bassand)所说,地方认同是一个不间断的集体创造性活动,一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和他者朝着共同的未来不断前进。割断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将不复存在。

那么,地方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认同三种的关系如何呢?在地方认同、国家认同已经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欧洲社会,欧洲认同构建能否成功呢?学界持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一些学者对认同构建持乐观态度,认为地方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认同三者可以并存。瓦尔特·凡·杰尔温(Walter van Gerven)指出,欧洲的公众观点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和欧洲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跨国认同的“欧洲感”越来越强。米切尔·巴萨德(Michel Bassand)提出,地方化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主义,地区认同与世界意识并非截然对立。如果一个地区的认同是生机勃勃的,那么这个地区将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有活力的合作者。瑞

Michel Bassand, *Culture and Regions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1993, pp. 186 - 187.

2007年3月20日访谈隆德2014年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申请策划人阿涅斯·李德贝克(Agnes Lidbeck)和简·尼尔森(Jane Nilsson)。

Reinhard Johler, "Local Europe", in Jonas Frykman & Peter Niedermöller eds., *Articulating Europe, local perspectives*,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 Press, 2003, p. 9.

Gerard Delanty and Chris Rumford, *Rethinking Europe: Social Theor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5.

Michel Bassand, *Culture and Regions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1993, p. 77.

Walter van Gerven, *The European Union: A Polity of States and Peopl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8.

典正进入一个新型的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随着电子信息交流和交通体系的畅通而发展起来的广泛的国际交往,进而使得空间上接近的地区之间的交流丧失了重要性。因此,地区文化政策必须着重加强本地区的创造力,使其居民更好地参与到正在形成中的跨国国家体系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大陆的地方开始欧洲化了。而随着包含于同时又超越了民族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欧洲认同的形成,一个新型的欧洲社会正在出现。

另一些学者则严厉批评了布鲁塞尔的欧洲认同建设工作。他们指出,民族认同来自根深蒂固的民族共同体归属感,而欧洲认同相对肤浅,只是知识分子和理想家的乌托邦之梦。而且“多样性中的一致性”这个口号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在欧盟倡导多样性和地方努力发掘地方特色的时候,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的努力实际上是失败的。

对于欧盟正在进行中的认同构建的种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也许问题的症结正是在于,在建设欧洲认同、重塑欧洲传统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应该不单单是欧洲的精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恰恰是欧洲的一般民众。他们必须介入这一历史进程,才能最终赋予欧盟合法性。因此,如何使地方欧洲化,如何引导欧洲公众参与欧盟建设,仍然将是布鲁塞尔当局长期面临的难题,也是欧盟文化治理面临的难题。

(作者简介:郭灵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莫伟)

Michel Bassand, *Culture and Regions of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ress, 1993, p. 58.

Cris Shore, *Building Europ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7.

Reinhard Johler, "The EU as Manufacturer of Tradi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Ullrich Kockel ed., *Culture and Economy*,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VT, US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225.

74 The Changing Swedish Cultural Policy: Regionalisation and Europeanisation

GUO Lingfe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wedish government incorporated the cultural policy into its national welfare system, and sought to offer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all the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social-cultural activities. But with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s,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Swedish cultural policy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towards loc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By examining the tendency and ag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cultural policy, the 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Swede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Sweden exerts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wedish cultural policy and that the Europeanisation of the Swedish cultural policy not only shows a tendency of culture as an agent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lends impetu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y.

89 A Reflection on the Europea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WU Xian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s reflected in the Europea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ustoms Union, the basis for star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CP surely contains some basic elements which embody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the Model. At least two of them can be identified from this policy: (1) Orientation of "Europeanization." The policy is directly orientated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market and towards unified market rules and orders at the European level, which can be seen clearly from its motivation, scope, uniformity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powers transferred to the EC. (2) Integration by law. The new legal order emerged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EC/EU constitutes the key means for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the policy. All the sources of Community law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guaranteeing the pursuit of the Community's aims, principles, scopes and exclusive competence.

99 An Analysis of the Lisbon Treaty and Its Prospects

WU Jiang

The Treaty of Lisbon marks a substantial breakthrough in the amendment procedur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which still maintain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EU Constitution. It signals that the EU will continue its reforms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capable. The Treaty of Lisbon is the result of compromises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U Constitution and the Lisbon Treaty exemplify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The change in its name from a "Constitution" to a "Treaty" demonstrates that the EU has not been ready to adopt a constitution. The successful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Lisbon is attributed to the close cooperation of the rotating presiden-